

常时候有活力，关键时刻有定力。

居委会的极限日常

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，想联系一名居委书记并不容易。他们的时间往往被各种防疫事务所占据，每天还至少要接上百个电话。有居委会干部调侃，办公室成了“夜总会”，因为“夜里总是开会”，其实也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开会。

“3月下旬小区封控后，我就开始睡在办公室了，你看这个钢丝床都已经睡得凹下去了。每天肯定是过了0点才能睡，但一到早上5点半就自然醒。”因长期保持极限工作状态，浦东新区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辰（化名）喉咙有些嘶哑。

在不到一个小时的的时间里，采访被数次打断：一会儿有老人来找林辰问配的药到了没有，一会儿又有人来问小区出门单怎么开。

林辰所在的居民区有5000多居民，但包括她在内，居委社工才10人。她坦言，在基层工作五年多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疫情，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，压力也前所未有的大。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，居委会人员、资源和权限非常有限。但在疫情封控期间，一方面上级千针万线的事情落到基层；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意见诉求、负面情绪也都宣泄在居委会头上，需要安抚。

“最开始，每天的核酸和阳性感染者及其密接的转运，成了矛盾的焦点。”林辰坦言，刚开始小区排队做核酸经验不足，加上几乎没有志愿者，几幢楼的人“轰隆隆”全下来，地方小、挤得近，有居民不满了：“你们是怎么安排的”“你这种人怎

么有水平在这里做书记？”……什么难听的话都有。

但转念一想，确实是做得还不够。因此，每次核酸后，林辰都会组织复盘，一次次优化流程，改进工作方法，提高效率，尽可能减少小区居民被感染的风险。

再说转运。疫情期间，上海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因核酸检测结果阳性，凌晨被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，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较大舆情。

“大家都知道‘应转尽转’。但具体到一些失能、高龄老人，又需要人文关怀，既不能简单粗暴，又要照顾同楼其他人的情绪。老实说，执行政策的弹性空间到底有多大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能尽量为居民争取最有利的方案。”林辰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首先要做好家属的工作，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，街道居委两级联动再想办法，“比如，遇到老人感染，不去方舱是不是能去条件比较好的隔离酒店，由专人点对点送老人到房间，安排同行一人一同前往；遇到家中有宠物的，是不是可以帮忙代为照顾……事实证明，大多数人从一开始的担忧、情绪激动，到最后都对我们表示了感谢，你是不是真心为他们着想，居民是能感受到的”。

因为有了转运，其他居民势必会想了解小区内的阳性感染情况。公不公开，又成了新的难题。

思前想后，林辰最后决定公开必要的信息，比如有没有新增，哪幢楼封控了，是否转运等。于是，4月1日，她第一次发了告居民书，“信息透明之后，居民的疑虑被打消，他们其实也能接受，心反而更踏实”。

慢慢地，居委工作的痛点转向了民生保障。封控久了，居

5月2日上午，青浦区恒大御澜庭二期的志愿者通知小区居民做核酸。摄影/唐春华



5月4日，小区邻里初中生为医务核酸检测人员手工做了简易的布兜，并画上了灰太狼抓羊、上海加油等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摄影/周公平 IP SHANGHAI

